

江苏省
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课题

传统 文化 与 精神 文明

周安伯 张秋良 著
张美娟 李 阳

民族出版社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

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

周安伯 张秋良 著
张美娟 李 阳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周安伯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5

ISBN 7-105-03494-7

I. 传… II. 周… III.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②精神文明—研究—中国 IV. 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56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2101—3100 册 定价: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从“对立思维”走向多维视野	(1)
摒弃“对立思维”(2) 以多维视野打开广阔的认 识空间(4)	
第二节 世界历史眼光的观照	(9)
把握“活着的”精神传统(9) “东学西渐”的有 益启示(12)	
第三节 民族精神升华的重要契机	(17)
民族精神生命力之所在(17) 超越本能状态(20) 努力实现综合创新(22)	
第二章 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	(25)
第一节 从两种极端主张中所引出的	(25)
“恢复传统”论缘何失足(25) “与传统决裂”体现 什么精神(31) 历史与现实之桥怎样架设(33)	
第二节 怎样认识革命队伍中的各种偏向	(35)
孙中山缘何从离异走向回归(35) “五四”引致几 种偏向之谜(41) 毛泽东的清醒与迷误所展示的(44)	
第三节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48)
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48) 坚持改造传统与	

	改造主体的辩证统一(49) 建立促进文化与人协调发展的良好机制(50)	
第三章	新的精神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52)
第一节	精心设计的战略环节	(52)
	新的风云际会中的妙棋高招(52) 历史经验结出的理论成果(54) 对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积极回应(56)	
第二节	“古今”“中西”问题的科学解决	(58)
	贯通古今之“正道”(58) 海纳百川之“雅量”(60) 谱写“两化”的新篇章(61)	
第三节	全方位的精神价值再创造	(65)
	新观念:立优于破(65) 着眼点: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再创造(67) 立足点:全方位的创新实践(68)	
第四章	确立全新的价值观	(71)
第一节	传统的价值观必须超越	(71)
	文化·价值·价值观(71) 传统价值观的内容(76) 传统价值观的双重效应(86)	
第二节	价值观更新的时代特点	(91)
	传统价值观更新的发端(92) 两种相反相成的偏误(95)	
第三节	新价值观的建构	(100)
	新价值观建构的基本原则(100) 在多元交融中超越和更新(103)	
第五章	实现传统道德的现代转换	(109)
第一节	紧迫的时代课题	(109)
	从“滑坡”与“爬坡”之争谈起(110) 传统道德现代转换的紧迫性(112) 传统道德现代转换的可能性(115)	
第二节	优秀道德传统的现代转换	(117)
	理直气壮地弘扬优秀道德传统(118) 实现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换(120)	

第三节	建立促进传统道德现代转换的良好机制·····	(132)
	切实搞好“伦理生态”建设(132) 实现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的有机结合(133) 培育能动主体与加强制度伦理相结合(135) 健全和强化道德教育和道德评价机制(136)	
第六章	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	(137)
第一节	彻底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	(137)
	源远流长的封建专制传统(137) 封建专制主义的当代流变(141) 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任重道远(149)	
第二节	批判继承民主法制传统 ·····	(153)
	古代“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153) 近代民主法制思想的批判继承(156) 现代民主法制传统的批判继承(160)	
第三节	大力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	(162)
	强化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162) 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166)	
第七章	弘扬科学的人文精神·····	(169)
第一节	中华人文精神之滥觞·····	(169)
	文明源头的智慧之果(169) 中华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174)	
第二节	在曲折中发展的中华人文精神·····	(182)
	中华人文精神的不断发展(182) 中华人文精神的扭曲和变形(186)	
第三节	谱写科学与人文结合的新篇章·····	(188)
	时代课题与独特优势(189) 正视人文精神方面的现实问题(192) 努力谱写崭新篇章(194)	
第八章	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197)

第一节	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	(197)
	直观的系统整体性(198) 朴素混沌的辩证性(203)	
	思维取向的实用性(206)	
第二节	传统思维方式对民族精神发展的深远影响·····	(207)
	促进主体系统领悟能力的提高(208) 增强实践理性精神(211)	
	引起经验主义和迷信思想的流传(213)	
	扼制开拓创新精神(216)	
第三节	建构现代化的思维方式·····	(217)
	在超越中重构(218) 在辩证综合中提升(221)	
	在更高层次上“扬长”(222)	
第九章	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新人·····	(225)
第一节	传统社会的“完人”情结·····	(225)
	传统文化中的“完人”人格设计(225) 塑造“完人”人格的优良传统(227)	
	“完人”人格的畸变(230)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与人格重塑·····	(233)
	市场经济对传统人格的反拨(233) 市场经济对人格塑造的负面影响(236)	
第三节	努力塑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人·····	(238)
	新人拒绝“市场人格”(238) 充分发挥传统优势(241)	
	诉诸系统实践(243)	
第十章	重铸中华文明新的辉煌·····	(245)
第一节	迥然不同的“复兴”说·····	(245)
	国内学者如是说(245) 国外的代表性观点(246)	
第二节	走上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坦途·····	(248)
	不可动摇的现实基础(248) 坚持正确的文化价值观(249)	
	采用“聚宝”的科学方法(252)	
主要参考文献	·····	(255)
后记	·····	(257)

第一章 绪 论

人类开始跨进现代史的门槛,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对于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底蕴特别深厚的国家,人们的议论自然特别的多。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又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人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即使是一些有学问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作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在这些思想家之中,只有那些站在世界历史发展高度并且学贯东西的大师们,才能以宏观的世界历史眼光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屋建瓴的观照,提出洞见历史真相的真知灼见。我们,致力于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则理应站在大师们的肩上,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对其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是我们的重要历史责任,也是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措施。

第一节 从“对立思维”走向多维视野

在近现代历史上,围绕着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的问题,国内外的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一些人在“绝对对立的思维中”观察和思考问题,因而提出了不少针锋相对的见解。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和

时代的进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基础的系统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复归”,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从对立思维”走向了以多维视野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从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真理性认识。

摒弃“对立思维”

对于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按照“对立思维”,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对立的看法。例如:

在对文化整体的认知层面上,西方的一些人从“西方文化优越论”出发,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映”模式。这一模式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描述为一个充满惰性的、停滞不前的体系,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方面都僵化了,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传统的框架。只是在19世纪以后,由于西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冲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才被迫作出反应,逐步向近现代演进。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是彻头彻尾的阻碍因素,没有一丝一毫的积极作用可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模式在中国也得到了了一些人的响应。与此相对立,“中国文化本位论”则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认为中国文化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中国文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向西方文化靠拢,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根本无须改造,这种传统的主体即伦常—政治—思维系统的弘扬,不仅将为中国开创美妙前景,而且将造福全人类。在这方面,梁漱溟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这本书中认为,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① 梁漱溟的这本书和他所宣传的这种思想,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99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在中国思想界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关系的认知层面上,国内外的学者也持有对立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现在,旧的经济制度已经被消灭,中国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物质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因此,传统文化就纯粹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阻力,不仅会严重妨碍物质文化建设,而且也将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在这些人看来,中国要搞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将传统文化完全抛弃掉,而全盘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尽管中国的物质文明不如西方,但精神文明却大大优越于西方,要推进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坚决拒绝“欧化东渐”,全盘继承传统的精神文明。从1919年秋至20年代初控制全国许多著名杂志的东方文化派露骨地鼓吹中西文明之争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争,中国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冠于全球;到后来绵延不绝的“儒学复兴”论,反复宣传所谓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提倡“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以此来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甚至主张把宋明理学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都是遵循的这种理论。由于主张“儒学复兴”的现代新儒家中的一些人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备受青年的尊敬和仰慕,加上不少报刊的相应宣传,这种思想的影响颇大。

在对时代性与传统性关系的认知层面上,“对立思维”也有着自由驰骋的广阔空间。有些人偏执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完全否认其传统性。一方面,他们对时代性进行机械的限制,将传统文化或等同于儒家文化,或等同于本土文化,或等同于古代文化,否定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开放的活生生的动态系统;另一方面,把“文化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的观念绝对化,以此来排斥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所以,在他们眼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

会的转型,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完全死亡了,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只有危害,根本谈不上任何积极作用。他们的基本态度和典型口号是“与传统决裂”。同这些人的观点相反,某些人的口号则是“恢复传统”。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只承认文化的传统性,完全否认其时代性。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经形成,就是非常完美的,根本不需要加以变革和发展,即使有发展,也只是将它不断扩充增加而已。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变迁、西学东渐、人心不古,中国传统文化横遭破坏,所以最重要的是努力“恢复传统”,非如此不足以推动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不足以实现现代化。

对于上述形而上学的做法和看法,从一开始就有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强调摒弃在“绝对对立中思维”的做法,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而辩证的历史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同新的实践和时代特点相结合,从而形成全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文化。近年来,经过热烈的争鸣和讨论,经过对历史经验包括上述“对立思维”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的思想从“对立思维”中解放了出来,并学会了以多维视野来思考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以多维视野打开广阔的认识空间

按照诠释学的观点,历史文化的诠释必然打上诠释者(主体)的烙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系统,不同的主体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在这里,人们的思维方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面讲到的某些人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矛盾境地,不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吗?我们之所以主张用多维视野来思考和认识问题,就是由于这样做,能够采用多种参照系统,以不同的观照方式和价值标准,打开广阔的认识空间,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为科学地发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

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用多维视野来认识问题,打开广阔而多彩的认识空间,我们就能看到用“对立思维”根本看不到的绚丽景观: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时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所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也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方面,一定时代的文化归根到底是该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文化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世界上决没有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抽象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人类解决自身同环境的矛盾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和水平的标志,也决不是人们凭空地、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文化具有十分明显的世代相传、不断累积的特点。灿烂辉煌、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逐步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文化的传统性。企图割断历史,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在一片空地上来随心所欲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厦,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必然由于缺乏根基而归于失败。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作为世代积累、不断更新的巨大文化系统,在历史的长河中表现为暂时性因素与继承性因素的统一。某些东西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544页。

因而存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消逝了；而另外一些东西则具有超越特定历史时代的久远价值乃至永恒价值，所以能够为世代所继承，作为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之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风俗习惯等融为一体，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这个问题，重温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论述，是很有意义的。列宁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很难遵从公共生活规则；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剥削、压迫消灭了，“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① 这一段话直接讲的是传统道德，但对分析整个传统文化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诉我们，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中，既有只适用于特定的社会制度的东西，又有许多适用于全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公共生活的恒久需要的东西。对于整个人类文化而言，前一种文化因素显然具有相对性，而后一种文化因素则具有绝对性。就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中的主干部分儒家文化带有鲜明的封建性、宗法性和专制性，从本质上讲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因此它的主导精神和许多内容必然具有相对性，只适用于已经逝去了的社会；但是，中国文化既然能够历数千年而不衰，经多少次劫难而不断显示其辉煌，其中必然包含绝对性的因素，必然有符合人类社会恒久需要的东西存在，像刚健自强的奋斗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穷本探原的求索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重视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博采众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尚变求和的辩证精神，等等，就是突出的体现。

在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问题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191页。

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虚无主义,就是将传统文化中的相对性因素极端化和绝对化,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都是暂时的、有限的东西,是随着传统时代和传统人的消逝一起消失的东西。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旗帜就是“反传统”、“与传统决裂”。这种人看似重视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更新,可是他们完全不懂得发展和更新的历史之逻辑,结果是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也就抽掉了当今文化的基础。所以,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另一种错误倾向是绝对主义,就是将传统文化看成全部是绝对性的因素,是世世代代相因相袭、毫无变化的东西,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只能顶礼膜拜、简单模仿,不能也无需动它分毫。很显然,这也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也是有害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价值的多面性和多重性。对于这一点,可以从多方面来分析。(1)从组成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各个部分来看,各种具体文化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如科学技术文化,突出的特点是技术发达而科学成分不足;在道德伦理文化方面,存在着重个人内心修养轻外向开拓、重群体协调伦理轻相互竞争道德的两重性;宗教文化也打上了明显的中国传统社会烙印,这主要是重入世轻出世、重今生轻来世,等等。(2)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来看,也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和鉴别。例如,有“封建性的糟粕”,有“民主性的精华”;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某种优秀的价值原则、人文精神,像《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等思想品质;有不带有政治社会属性的人类智慧的结晶,像《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多算胜,少算不胜”等;有封建的思想内容与有用的精神因素的混合物,像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为代表的古代“民本”思想,儒家经典中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法家经典中的“法治”思想;还有积极的人文精神以维护传统社会的方式表现出来,古代的爱国主义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不就是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吗?(3)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观念来看,它们本身就是

“一身而二任”的，即集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于一身的。“孝悌”观念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它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之上，既衍生出了具有人道主义合理意义的“尊老爱幼”行为模式，也衍生出了削弱人权平等、限制人格自由的“尊卑有序”人格模式；在文化意义上，它还派生出了“仁”的心理结构和“礼”的社会规范，由此，人们既可以称之为“礼仪之邦”的文明精华，也可以斥之为“吃人礼教”的历史糟粕。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决不能用“好”与“不好”、“精华”与“糟粕”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来进行价值判断。建立在这种形而上学价值判断上的“取”和“弃”、“继承”和“抛弃”，必然是有害无益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以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要素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具体的分析、梳理和研究，从中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同时，根据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多元开放的思维视野和价值标准，选择其中的有用成分，服务于新时期的文化建设。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民族性与人类性的辩证统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来，并经本民族的杰出思想家们以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总结和概括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民族风格，这就是它的民族性。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都同它的民族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又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与人类性辩证结合的。因为中国的先民在解决与环境矛盾的过程中进行文化创造的时候，既是从具体的民族情况出发，又是从人类共同面对和需要解决的普遍矛盾出发的。由此而达成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不能不同时具有民族性与人类性两个方面的特性。像“天人相分”、“天人合一”这样的命题，既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又从一种重要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文化成果；像“万物莫不有对”、“一物两体”、“一分为二”、“物极必反”、“和而不同”的辩证法

思想,以及“变化日新”的世界观,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河之中,更是富于中国人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经世致用”的历史责任感,修己爱人、自省慎独、自尊尊人、敬业乐群的君子人格,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所提供的瑰宝;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不既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真谛,又是最具人类普遍性的黄金规则吗?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在《幸福论》一文中赞扬这一思想是一种“不离开人的理性本性所赋予人的那种义务的道德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对它抱有与此同样的认识和态度,由此足见它对于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性文化价值。

第二节 世界历史眼光的观照

在摒弃“对立思维”,确立多维视野之后,如果我们进一步以世界历史眼光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我们的认识将有“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把握“活着的”精神传统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的精神文化,无不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这种民族精神传统是不断流变、生生不息的。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可谓独具慧眼。他认为,“这种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① 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把民族精神视为凝固僵死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是形而上学的见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写到这里,很自然地想起西方文化研究中起支配作用的两种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8页。

对立的传统：英、美传统与德国传统。英、美传统的文化研究者将文化理解为既定事实的各种形态的总和，即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德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者则将文化理解为一种以生命或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即生活的样态。德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者认为，文化的形态化、制度化、模式化意味着文化的死亡，因此他们有所谓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了的文化之类的说法。尽管这两种观点都包含真理、也都有片面性，但从基本精神上来讲，德国传统更能把握文化中的律动的脉搏和活的灵魂，更符合辩证法。当然，为了彻底贯彻辩证法，我们还是应该像张岱年先生所讲的那样，将两种传统相结合，“把对文化已成形态的研究和文化已成形态中活的灵魂的研究辩证地统一起来。”^①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尤其要注意防止僵化的、凝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真正将它当作是一种“活着的”动态的系统，把握其活的灵魂，洞察它从往昔向当代演变的轨迹，把握它同现实的本质联系。

上述要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任何热心研究者都是最基本的。然而，真正达到这种要求，也并不是很容易的。就连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同上述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从哲学的高度发表了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他称中国为“那个永无变动的单一”，还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②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偏见，黑格尔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将中国文化视为自身“永无变动”的僵死的东西，似乎只能够“等

^① 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58、161页。